



王兆胜 著



● 文艺批评书系

天道与人道：

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王兆胜 著

天道与人道：

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王兆胜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649-3003-5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7102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责任校对 何 新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52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印之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31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王兆胜，男，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编审、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中国文学批评》副主编，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有《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与中国文化》《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新时期散文发展向度》《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等15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散文随笔集《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负道抱器》等，作品入选中学教材、中高考试题和各种选本。曾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

自序

我曾出过两本文论集，一是《文学的命脉》（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二是《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这是我的第三本文论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选文章以前均未结集出版过，主体内容是 2011 年后发表的文章。

之所以将这本文论集的关键词定为“天道与人道”，主要有如下考虑：自从五四新文学开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后，中国新文学就开始强调“人”，强调人的解放，以及人的个性张扬与自由发展，此所谓“人道”之盛行者也；不过，其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天道”，忽略了天地宇宙对于“人”的制约与规范，于是“人”在获得了其巨大发展的同时，又进入了随意而为甚至“无法无天”的泥淖。我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应兼顾“天道”与“人道”，在充分发挥现代性维度，强调人的创造性智慧的同时，不能无视天地自然对于“人”的根本性限度，这是保证人保持谦卑、敬畏之心，不被个性与欲望异化的前提。因此，如何在“天道”与“人道”的辩证理解中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是本书的一个基本框架与价值标准。

有了仰天俯地的开阔境界与视域，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就容易形成“目张”与“心开”的可能。中国人历来强调“目”之作用。在文物收藏中讲“一眼真假”，这不是科学方法所能解释的，有时主要靠经验而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观千剑而后识器”。我希望通过一双眼睛能鉴别真伪，看到文章的价值所在。中国人还特别注重

“心”的力量。我一向推崇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不可小觑其“心”。林语堂也曾有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拥有“一心”，再来“评”说，此所谓“心评”。

如今，我们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往往主要靠“大脑”，唯独没有心灵的参与，那么，情感、悟性、人生和生命的投入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为什么，在许多文章里，概念满天飞，充满令人生厌的生搬硬套的逻辑，让人不忍卒读。我希望自己的文章有双慧眼，是用心和生命写成，并透出一股鲜活的灵气儿。

本书收录的文章，多是“十目一行”细读的结果，从中可见研究的理路、耐心与执著。但另一方面，与不少人写作的难产与痛苦不同，我希望将研究变成人生内容之一部甚至是全部，其间可充满自由的表达和生命之舞的快乐与酣畅淋漓。于是，文学研究让我感到天地之宽、宇宙之大、人性之美、人生之趣，一种不断超越自我而获得灵魂飞升的可能。

从体例上说，本书包括四部分：第一辑为“理论话语建构”，着重探讨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理论支点。第二辑为“思想文化融通”，主要站在古今、中西、城乡、内外境域等角度谈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价值选择。第三辑为“情感生命飞扬”，着力强调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心灵体悟与审美境界，因为过于理性甚至刻板钙化的研究已成为当下的痼疾。第四辑为“艺术形式探寻”，着眼于方法论的意义，尤其是强调细节和细读之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作用，因为离开对于文本的独特观照方式，许多努力都会落空甚至是南辕北辙。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严格意义上说，理论、方法、审美、趣味甚至生命的全身心投入是不能绝缘分开的。

中国古代文学总体上是在“天人合一”境界下的产物，其最大特点是高度重视“天”及其“天道”，但相对忽略“人”的力量，所以“人”的个性、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抑制。因此，我们强调的“天道”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回归，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入人的现代性，使之成为不受压抑、能显示天地间人性光辉的大写的“人”。这就克服了古代

“天道”与“人的文学”的局限，而在“融通”中获得新的“再造”功能。

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至今已逾百年，其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时下，创新与探讨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增长点已成共识，作为“天道与人道”辩证关系之下的一种反思，我的研究理路希望能给人带来一点启发。由于个人视野水平所限，本书不当甚至错误之处还请学界同仁指正批评。

是为序。

王兆胜

2017年1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理论话语建构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3)
中国散文理论话语的自主性问题	(65)
黄钟大吕与金声玉振	
——朱德发的学术品格及追求	(72)
当前散文研究的瓶颈与突破	
——兼论陈剑晖的散文理论建构	(88)
中国新文学研究增殖及其路径选择	(99)

第二辑 思想文化融通

贤妻良母：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	(123)
《中国人的宗教》：边缘人生的奇思逸笔	(128)
当下中国散文的软肋	(134)
王统照的戏剧观及创作	(145)
林非散文的精神向度	(154)
朱马拜小说的“知”与“不知”	(173)

忧思弦上发清音

- 谈王尧散文随笔的精神旨趣 (181)

思想的芦苇与灵魂的吟唱

- 广西散文新势力 (195)

第三辑 情感生命飞扬

- 天唱的绝响 (207)

纯真与博大

- 林非散文的情感世界 (211)

心灵的光辉照彻大地

- 读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 (231)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个体存在问题

- 肖鹰教授的《真实与无限》 (234)

- 《金粉世家》与《红楼梦》 (237)

- 金质玉润总关情:吴克敬散文创作略论 (248)

裸心、逸笔涂抹潇洒人生

- 评莫怀戚小说《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 (258)

- 赛飞用“海岛散文”弹奏生命乐章 (268)

- 八位散文家艺术生命的花开花落 (279)

- 柳冬妩为文学研究注入真性情 (282)

第四辑 艺术形式探寻

- 学术语言的现状与理想 (289)

建筑·哭笑·骂词·声响

- 《雷雨》细节解读 (296)

娓娓道来知心语

- 林非散文的叙述模式 (316)

- 傅德岷《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330)

诗性与理性的融合

——评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	(332)
“还原式”研究：张永泉的《从周树人到鲁迅》	(334)
双峰飞渡有鸿声：丁晓原的散文研究	(339)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的清明圆融	(344)
“正途”与“异路” ——我的学术研究方式与路径	(354)
后 记	(368)

第一辑
理论话语建构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一直比较重视观念更新、理论突破与方法论革命,其中,有两大高峰最为显著:一是“五四”前后,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对于前者,学术界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于后者,虽不乏有价值的著述,但却存在着零散、随意、表面化、简单化甚至不无偏激的探讨、理解和认识,更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有深度的总结性研究。究其因,这当然与学者理性自觉的缺乏有关,也与研究者相对忽略理论与方法的价值意义有关。本文拟站在中国立场,以历史的态度、世界性视野、前瞻性眼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辨析,努力寻找其内在规律,探讨其问题的关节点,评估其功过得失,从而为文学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参照和启示。

一 从生硬走向成熟: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进程

就目前情况看,对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之考察,学术界基本处于孤立和肢解状态:一是将重心放在80年代,对其他时段的研究不够,更忽略新时期的整体性、发展性和生成性;二是学科之间的隔膜,有时又是壁垒森严,使研究难以突破,这就影响了统一性观照;三是年代综述、学术会议较多,但往往失于简单和狭窄,这就容易浅尝辄止;四是忽略了“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一参照,易过于贬低新

时期这一逻辑起点。事实上,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就如同一棵大树和一条河流,它有根有源、有始有终,须以动态、发展和辩证的眼光进行审视和理解。

一是大胆引进和饥渴吸纳期(1977—1989)

新时期的开端确实面临着百废待举的态势:经过十年“文革”,不论是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语境,还是学者个人身体和学术生命的被摧残,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过,如果将“五四”以来的传统考虑在内,并将之作为文化尤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来看,那么,对新时期就会有全新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大门一经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理论和新方法竟能在短短数载进入国内,并席卷全国,如果没有五四精神这一传统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从时间的快捷、拿来的大胆、吸收的胃口,以及影响的深远等方面看,中国在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上,新时期远远越过五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前后掀起的“新方法热”和“新观念热”,它以革命的方式在中国文坛产生巨大震动。

较有代表性的是厦门大学的林兴宅,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系统理论,并开始将这一理论引入文学研究,到1984年则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和结出了坚实的果实,这就是《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和《论文学艺术的魅力》(《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两篇文章。以《论阿Q性格系统》为例,以往的研究是将阿Q作为一个贫雇农的典型来看的,其“精神胜利法”是其核心性格,从中反映了鲁迅对于封建专制和奴性的批判。然而,作者却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看到了阿Q的复杂性格,即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自轻自贱、争强好胜而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而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而又安于现状。以此,作者认为,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具有双重人格的奴才形象,鲁迅以此来批判专制主义制度,唤醒民众和改造国民性。在文末,作者这样写道:“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

Q 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各种性格元素通过特征的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它们有机联系、不可分割,被奴性的典型这一自然质制驭着。如果把某种性格元素从这个网络结构中分离出来,孤立考察,那么它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出现新的意义。孤立地考察某种性格元素,不可能正确理解阿 Q 性格的本质。”^①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是有突破和创新意义的,它成为“新方法热”的开端,说它引发了一场文学理论和方法革命也未尝不可!不过,也应该承认,用科学方法来直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包括其二元对立的多项概括,都有生硬拼对之嫌,反映了研究者将理论与方法同文学研究对象直接对接的明显意图与强烈痕迹。

另一位用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学的是何新。早在 1980 年,何新就发表了《什么是“意识流”?》(《北京晚报》1980 年 7 月 28 日)。1985 年,他又发表了《艺术现象的符号学分析》(《学习与探索》1985 年第 5 期)和《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读书》1985 年第 11 期)两文。1986 年,他连续发表了《论“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文艺研究》1986 年第 1 期)、《文化形态学的概念与理论》(《人文杂志》1986 年第 1 期)、《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再论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文学自由谈》1986 年第 2 期)和《〈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读书》1986 年第 7 期)。而到 1987 年,何新又出版了《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一书。值得提及的是《〈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一文,这是直接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对小说进行分析,其对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官本位思想的探讨都深入独到和入木三分,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这种将西方理论与方法直接用于作品分析,并一一对号式的研究,也带来了文章的粗率和模式化,这是此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共性特点,也是局限性所在。因为不考虑中西文化语境差异,将西方理论搬到中国,是一种隔膜;而不顾学

① 《鲁迅研究》1984 年第 1 期。

科差异,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学问题,也是一种隔膜。

刘再复于1984年先后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和明确性》(《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三篇文章,后于1986年出版了《性格组合论》一书。其中,他明显受到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所以,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刘再复能看到人物形象的内在结构、复杂意蕴以及深层心理,尤其是人物性格的内宇宙。不过,与林兴宅、何新一样,刘再复在用二重组合原理分析人物时,仍显得生硬、刻板甚至有些僵化和类同,因为人物形象不可能像他所分析的那样,用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子去进行丈量。

黄曼君在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文章值得注意,这为郭沫若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鲜气息。像《论〈女神〉中象征形象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表现·创造·变形:郭沫若诗歌艺术新论》(《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3期)、《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2期),都是用西方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来研究文本,且充满诗性的灵光。

陈晓明是用西方新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和解读的另一代表人物。此时间,他的文章数量多,视野广阔,具有敏锐的前卫特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较有代表性的有《文学的苦闷》(《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2期)、《论文学视界——文学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3期)、《论象征的审美特性》(《美学新潮》1987年第5期)、《复调和声的二元变奏——论〈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论文学本文的语义蕴涵》(《艺术广角》1988年第5期)等。1989年,是陈晓明的丰收年,仅此一年,他就发表了《拆除深度模式》(《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无边的存在:小说语言的临界叙述》(《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文学的巴比伦塔已经倒塌》(《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2期)、《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

化》(《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后新潮小说的叙述变奏》(《上海文学》1989年第7期)、《先锋派与文明解体》(与靳大成等合作,《上海文学》1989年第5期)、《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先锋小说》(与王宁合作,《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等。从某种意义上,称1989年为陈晓明的“方法年”也不为过。

此时段,还有一些与西方理论和方法有关,尤其是以此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著述,像吴思敬的《说“朦胧”》较早引进西方的“模糊”理论,这在诗歌界开了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研究诗歌现象的先河。除此外,还包括如下著述:张德林的《人物意识流动的深层结构》(《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2期),陈辽的《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文汇报》1984年7月4日),鲁萌的《诗歌的信息系统概论》(《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程文超的《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乐黛云的《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小说研究》1985年1—6期),王一川的《从信息角度看艺术》(《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王春元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心理结构》(《红旗》1986年第4期),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程光炜的《反讽的意义——对第三代诗语言现象的一个考察》(《山花》1988年第4期,与王丽丽合作)和《女性诗歌语言结构的功能分析》(《上海文学》1989年第6期)、张中良的《宝玉之痴——〈红楼梦〉的心理分析之一》(《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后来,鲁枢元这样谈自己的“向内转”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我同时发现,19世纪以来,心理学与文学呈现出一派相互渗透、同步前进的有趣现象。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的阐释,弗洛伊德、荣格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剖析,格式塔心理学对‘创造性活动’的独特论证,皮亚杰对‘认识的主观性’的证明,列昂节夫等人对‘个性化含义’的强调,使我坚信人类拥有一个复杂灵妙的‘内宇宙’,文学艺术正是这